

#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基质

刘维兰<sup>1 2</sup>

(1.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淮南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系,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传入中国,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这其中除去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魅力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信仰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根基的原因,旨在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0)02-0010-03

弗洛姆说过:“人在信仰中存在,而非占有信仰。”<sup>[1]</sup>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信仰的内在发生机制是人的情感和意愿需要的内化。人们有什么样的信仰,虽然离不开科学知识发展水平,但更多的是与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种理论传入中国,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首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蕴含的魅力和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社会需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sup>[2]</sup>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和中国文化有许多契合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了文化根基。因为,认识是信仰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的信仰,中间要经历一个被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从认识发生的角度说,认识就是主体用既有的认识结构和认识图式对外界信息的选择、顺应和同化的过程,而外界信息与主体的认识图式是否有契合点,是决定认识图式对新信息是接收还是拒斥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接受并成为人们的信仰,是因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结合点和生长点,取得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

## 一、现实的人文价值目标相通

人文就是重视人的文化。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把人看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式个人的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在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与儒家入世思想相契合的。冯友兰先生说:“儒学就是人学。”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认为孔子以来整个儒学传统的基本关怀在于此岸的人间性,而不在于彼岸的超越性。其突出体现是孔子“仁”思想的提出。《中庸》说:“仁者,人也。”认为仁就是人存在的本质和价值根源,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人所应当为之的责任,其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就是爱人。“忠恕”是实现“仁”的途径,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要求每个人在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也要认识和考虑到他人的价值。可见,儒家入世侧重于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理解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仁者,爱人”,这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人与人交往和谐性的前提,也是人社会性存在本质的体现,这虽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36</sup>的界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郭沫若对此称赞说:孔子的“仁”是

收稿日期 2009-12-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BKS065);江苏社会科学基金(09MLA001)

作者简介 刘维兰(1971—),女,安徽淮南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人的发现”<sup>[3]</sup>。

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强调血缘伦理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不仅作为个体而存在,同时又处于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之中,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认为群体价值重于个体价值,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和彰显个人存在的意义。虽然儒家思想把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自我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置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也没有绝对否认个体价值的合理性。因为仁既是人的本质,又是人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张岱年先生称,仁是“人己兼顾的”<sup>[4]</sup>。这种本质的实现不仅需要社会的规范与和谐有序,而且需要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个性的自由发挥是群体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强调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儒家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来肯定人,既把人的社会价值看成是人的价值中心,又不因此而否定个体的作用与价值,而是强调个体自我的实现与群体、社会的和谐有序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儒家不是把“仁”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仁”扩充到整个宇宙。从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到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的思想,不是把自然仅仅看做是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而是看成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存在,主张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同时,又强调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必须合理。这些思想也体现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就像一位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概括:“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不仅仅作为无机的或有机的物质出现,而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和自然的共同本质。”<sup>[5]</sup>

儒家把“仁”视为人的本质,它是通过自我不断地躬行践履而达到他们所理想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实现人的发展。儒家的人学思想强调人的社会性,认识到了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看到了人的实践性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关心人、并在社会性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一致是相通的。不过由于古代思想家不了解人的社会性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他们往往只是从政治、伦理等关系来理解人的社会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是无法比拟的。但是,儒家的人学思想毕竟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对人的关注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与马克思主义人

学思想的契合却成为中国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内在驱动力。

## 二、终极的社会理想相通

现实关怀是终极关怀的基础,终极目标是现实关怀的指向。“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sup>[6]</sup>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把实现公平、友爱、和谐的社会作为最终的目标。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sup>[7]</sup>。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立足于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入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和革命运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sup>[8]</sup>。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大概的设计,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大同社会有契合之处。

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世俗世界的人伦日用,关注现实生活,但它并没有失去超越性和神圣性的向度以及终极关怀的意义。因为他们不仅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更注重对个体心灵的自我超越,不仅要修身,而且还要把这种心性修养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上,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表现为“博施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自身内部入手挖掘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修身,由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社会的特征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社会和谐。在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儒家学派就设想出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类普遍幸福的大同世界,马克思曾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sup>[9]</sup>。从那时起,这种大同世界也就成为我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从《礼记》中的大同世界的构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主张,从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到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天

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王国”,目的都是要实现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平等。儒家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主张不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吗?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只希望通过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来实现,只能是空想。虽然儒家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质上的不同,但却有着学理上的相通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而且使得中国人一见到马克思主义就倍感亲切。就像梁启超所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它不是外来的,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sup>[10]</sup>社会理想的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树立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 三、辩证的思维方式相通

思维方式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由实践活动方式决定的思维样式,是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由于实践活动方式不同,决定了每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辩证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sup>[11]</sup>古代的先哲们在观察自然现象、社会生活以及探索人自身的机体活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涉及自然演进、社会发展和人生修养等有关历史进程的诸多领域。

确如毛泽东所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sup>[12]</sup>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人们不仅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物物相依”、“相辅相成”、“天人合一”,而且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日新”、“吐故纳新”,且这种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强调阴阳对立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把平和不平(陂)、往和复这些互相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指出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战国时期的《老子》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和“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指出事物向相反方向的转化,即自我否定,是合乎规律的运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sup>[13]</sup>《老子》在承认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同时,还认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看到了事物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这些思想在后世的一些思想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张载的“一物两体”到王安石的“万物莫不有耦”、“耦中又自有耦”的命题,从程颐的“物极必反”到王夫之的“新故相除”的深刻观点,把辩证法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些自先秦起就绵延不绝的古代思想对“辩证法”做了深刻理解与精彩表述,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体现在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程中显示其辩证法思想的,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如此。既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又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矛盾为实质和核心,科学地阐释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原因和动力,特别是指明了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以辩证思维的方式来认识世界,重视辩证法,而且都把事物内部的矛盾及矛盾关系看成是核心和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这种在思维方法上的相通性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背景。虽然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比,只是对客观世界辩证本性的直观把握,只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但正是因为我国人民的思维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才能在当时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时,能够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像列宁所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的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sup>[14]</sup>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并成为中国人的信仰的思想桥梁。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任何社会,绝不可能完全破除和断弃其传统而另起炉灶创立一个全新的文化系统。”<sup>[15]</sup>所以,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的信仰,首先必须结合中国文化信仰的特点和精神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文化元素之中,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的形式,内化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那种希望抛弃传统文化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虽然反映了人类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中国(下转第28页)

存在价值选择的可能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社会中有用的，但它也是能用来杀人的。”<sup>⑩</sup>科学理性是物的逻辑，而价值理性是人的逻辑。人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必然性，人的发展必须通过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实现，而科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关注人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生态危机、环境灾难、资源枯竭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与纷争、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惑……正是由于科学背离了价值导向造成的。人类社会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合理运用科学理性才会使科学与人的自由始终如一、同步、和谐发展。只有坚持人文精神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人类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由此可见，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因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上接第12页)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庞杂文化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积极回应实践发展要求，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切实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在于大众的现实生命本身。

#### 参考文献：

[1] 马斯洛. 人的潜能与价值[M]. 林方,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344.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88.

[4]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61.

[5] 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学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2): 10-15.

[6] 胡锦涛.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在省部级主

####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0.

[2]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 特别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上卷[M]. 罗达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97.

[3]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11.

[4] 黄健. 科学理性的人文反思[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0): 26-29.

[5] 威廉·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M]. 段德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24.

[6] 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50.

[7] 王桂山. 技术理性的认识论研究[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 93.

[8] 何继业.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及伦理风险[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149-152.

[9] 周兰珍.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6): 38-41.

[10]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M]. 许良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6.

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5-06-27(1).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7.

[8] 黄明理, 赵政委, 戴锐. 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大众化的内在逻辑[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3): 41-44.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05.

[10]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10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984.

[1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3卷[M].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组,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337.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03.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2.

[14] 列宁. 列宁选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99.

[15] 荆学民. 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25.